

中国诗学丛书



张明非 主编

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

蒋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丛书

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

蒋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 / 蒋寅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9

(中国诗学丛书/张明非主编)

ISBN 7-5633-3315-0

I. 中… II. 蒋… III. 诗歌—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86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 字数: 3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1 000 定价: 1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张明非

中国自古以来便享有“诗的国度”的美誉，前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灿烂的诗学遗产，不仅对后世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80年代以来，中国诗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努力推进中国诗学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诗学丛书》便是广西师范大学一批中青年学人联合国内几位青年学者在诗学研究这片沃土上收获的第一批果实，是我们在诗学研究领域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

确定以中国诗学为研究对象，是在充分认识到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广泛了解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经过了认真思考、反复酝酿、周密论证的，其中既考虑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学术的现实需要，也考虑到参与这一系统工程的每一位学者的学科特点和学术专长。经过长期积累和不断探索，有着近70年历史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国诗学方面已经建立起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拥有了一批有志于长期从事中国诗学研究的学人，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与校内外一些学有专长的诗学研究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只要大家通力合作，既发挥各学科优势，又实现学科优势互补，我们在诗学研究方面就一定可以闯出自己的新路。

中国诗学是一个涵盖极广、蕴涵极丰的研究领域。我们

这里所说的“中国诗学”，是一个比较文学的概念，即强调中国的诗学特质与其他民族在文化学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便是以深入研究和系统阐发中国文学艺术的“诗学特质”为基本目标，以对中国文学的抒情性本质的理论研究为对象，通过对中国自古以来表现出的以诗歌为中心、各类文体均具有的强烈的“诗化”倾向等独特的文学现象，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或文学层面加以研究，以说明中国文学的实质及其特殊表达机制。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诗学研究理应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展开。因此，我们在坚持传统诗学研究学理的同时，把引进现代学术理念，建构适应现代学术发展要求的研究模式，作为我们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力图通过对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宽广的学术背景、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应有的理论深度；通过对中国古代诗学、现当代诗学、少数民族诗学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中国诗学的精神实质，从不同的侧面阐扬中国诗学的现代价值，对中国诗学体系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通过对语言学、音韵学的相关研究，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并注入新鲜的活力。有鉴于此，举凡中国文化中的诗性思维，中国诗学的表达机制，中国诗学与语言、哲学、文化、宗教等的内在联系等现象，都将纳入研究的视野；诸如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诗学理论的某种一致性，诗学现象中复杂的文化机制和美学原则等问题，都应受到关注。所有这些努力，都围绕一个目的：寻找中国诗学特殊性的理论规定，以及它在现代诗学理论和文化建设中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为此，我们在指导思想强调以历史主义为原则，强调宏观比较的理论立场与扎实严谨的微观研究相结合，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则主张多元互补。不论是中国传统的考据、感悟和史传的方法，还是西方的符号学方法、精神分析方法、语言学方法、意识形态分析方法，都根据研究的需要加以选取，并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一切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进行，即把开掘、研究、阐述中国诗学内质贯穿其中，努力把握其内在的血

肉相连的贯通脉络,而不是把研究对象孤立和割裂开来。这样,每一个专题虽论题各别、观点自异,但都联结在“诗学物质”这一中心点上,从而形成有鲜明特色、有现代学术品格,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研究模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对中国诗学研究有所推进和发展。同时在实践中使我们的科研群体得以更快更好地成长和提高。我们热切期待着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

在《中国诗学丛书》第一批著作付梓之前,我们谨向一切曾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人们表示最诚挚、最深切的谢意。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诗学研究的先行者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开拓和启示,很难想像会有我们今天的研究实绩;我们由衷地感谢国内一些著名学者慨然应允做我们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委,是他们的信赖和支持,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我们还要感谢广西教育厅把中国诗学系列研究作为重点项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来是我们亲密合作的伙伴和坚强后盾,一如既往地这套丛书的面世做了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将激励我们更加奋发努力。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仅仅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诗学研究的路正长,我们将以更高的目标,更强的开拓精神,更脚踏实地的工作,去争取更多更好的实绩。

2000年9月

中国诗歌的结构观念

第三章

——起承转合与机械结构论的消长·(70)

- 一、“起承转合”之说的由来·(71)
- 二、起承转合与八股文之关系·(74)
- 三、起承转合之说在诗学中的展开·(78)
- 四、诗学对起承转合之说的清算·(81)

中国诗歌传统的形成(上)

第四章

——《诗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性格·(89)

- 一、忧患意识在《诗经》中的表现·(90)
- 二、忧患意识的民族性与时代性·(97)
- 三、忧患意识的衍变·(101)
- 四、忧患意识与中国诗歌的感伤传统·(103)

中国诗歌传统的形成(下)

第五章

——情景交融表现方式的定型·(108)

- 一、走向情景交融:动机与取境·(109)
- 二、以佛学为中介的思维转换:观物、观心与境·(115)
- 三、艺术表现的自觉:移情·烘托·象征·(121)

中国诗歌的心态史意义

第六章

——从《离骚》看理想的冲突与悲剧的超越·(129)

- 一、生存还是毁灭·(131)
- 二、后人眼中的屈原形象·(140)

中国诗史上的接受和影响

第七章

——以大历诗人对谢朓的接受为例·(147)

四、权德舆与中唐诗坛·(253)

第十二章

中国诗史上领袖人物的作用

——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257)

一、“诗余之人”与“诗余之地”·(259)

二、词学传统的重新确认·(266)

三、王渔洋词学的影响·(272)

第十三章

中国诗学中的声律理论

——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274)

一、前《声调谱》时代：古诗声调之成为问题·(275)

二、《声调谱》时代：王士禛、赵执信的反律化理论与古诗声调论之草创·(281)

三、续《声调谱》时代：乾隆学者的拾遗补阙与古诗声调论之传播·(287)

四、后《声调谱》时代：嘉庆学者对规则的解释与古诗声调论之深化·(296)

五、新《声调谱》时代：方法论改造与仿律化理论的吊诡·(300)

六、反《声调谱》的理论：古诗声调说的扬弃与超越·(309)

第十四章

中国诗学中的学者素质

——钱钟书《谈艺录》的启示·(316)

一、钱钟书的学术境界·(317)

二、学者的独立人格·(318)

三、博通中西的知识结构·(321)

四、洞幽烛微的识见·(324)

五、至法无法·(327)

六、学术的自足性·(328)

参考文献·(331)

后记·(333)

导 论：20 世纪的中国诗学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也有着同样悠久的诗歌研究，诗学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数量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部门。在世纪的尽头回首过往，诗学仍然是我们反思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总结经验、开创古典文学研究新纪元的起点。为此，我想借对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回顾来开始我的论述，在 20 世纪的学术背景下展开我对中国诗学研究的思考和实践。

自本世纪初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以来，中国大陆的诗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那就是：（1）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清理；（2）50 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的诗歌史研究；（3）80 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诗学研究。

在具体论述上述过程之前，首先有必要就“中国诗学”的概念作一番检讨。因为从近代以来，学术界使用这一概念内涵很不一样。就我所知，较早使用“中国诗学”这一概念的著作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涉及的面颇广。田明凡《中国诗学研究》（自刊本；大学出版社，1934），内容范围也包括演变、派别即诗史的问题。与杨书同年出版的江恒源所撰同名著作（大东书局）以及稍后的范况《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则局限于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大致上说，民国间人们理解的中国诗学，内容还是较丰富的，不只限于诗的作法、体制，还包括诗歌的历史发展。从学术急速发展的 70 年代以来，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

出版社,1976)分为“思想”、“设计”、“鉴赏”、“考据”四部分,研究的是诗歌被创作与接受的过程。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学生书局,1980)从最古老的命题“诗言志”讲到“诗教”,除最后一节涉及今日“诗的方向”外,未在传统的诗法中加入新的内容。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基本上将中国诗学作为一个诗歌创作理论体系来把握,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所涉及的内容大抵也不出文学概论体系的范围。换言之,中国诗学的概念近代以来主要是作为中国的诗歌原理来把握的,而且当今的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将它理解成关于诗歌写作和意义实现过程的理论。对照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的概念(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来说,这样的理论构成实际上只承担了与文学理论相对应的诗歌理论这一部分狭窄的内容。这对中国诗学的概念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今天的中国诗学研究,尤其是建立一门学术来说就更不利了。“诗学”(poetic)一词,在西洋文学史上最初是“意味着一种应使不熟练者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实用教程”^①,后来用以指称文艺学。而在中国,撇开专指《诗经》研究的用法不论,“诗学”意味着与诗歌有关的所有学问,或者说是一门关于诗的学问。凡用“诗学”字样命名的著作,如明代黄溥的《诗学权舆》,周鸣的《诗学梯航》,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莫不如此。“中国诗学”,核心在一个“学”字,这个“学”不仅包括历来人们对诗歌本身及其创作方法的认识,还应包括古今人对诗歌史的认识及对认识过程的反思。这样,我理解的中国诗学,就正如我与张伯伟主编的同名论丛一样,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1)诗学文献学,(2)诗歌原理,(3)诗歌史,(4)诗学史,(5)中外诗学比较。从这五个方面来回顾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近百年的诗学产生了浩繁的著作,全部阅读决不

① 埃米尔·施塔格尔(Emil Staiger):《诗学的基本概念》,1页,胡其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也不是本文所能包容的。况且,本文的宗旨既不是要评功过,也不是要排座次,只是想从学术方式的角度对中国大陆诗学研究的发展作个粗略的回顾,从得失中思考进步之途,挂一漏万之处,以及述得者少,述失者多,只能请读者谅解。词曲之学,按我的理解是应该属于中国诗学范围的,但因这部分内容分量很大,又需要专门的知识,非我所能置喙,且留待专家去论述。

一、形式的传统:殊途同归的诗学研究

如果依照文学史研究中“现代”的年限,那么现代中国诗学是由诗学文献学拉开序幕的。伴随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兴旺的出版业为诗学文献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丁福保所作的贡献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他在1916年印行何文焕编《历代诗话》28种、自辑《历代诗话续编》29种、《清诗话》43种,网罗了古代诗学典籍中最杰出的著作,学者一编在手,检阅至为方便。到1927年,郭绍虞又开始着手《宋诗话辑佚》的工作,历代诗学典籍的整理由是初具规模。应该说,现代的中国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并逐步形成自己重视文献研究的传统。与此同时,黄节以《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等经典注释,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古典诗歌注释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为现代的诗学研究开辟了一种由注释入手进行研究的良好学风。概观1949年以前的中国诗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诗法研究与诗体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动机是应用性的,以教人作诗为目的,所以内容以综合传统诗学的精华为主,较少理论阐发和分析;后者的动机出于回应“五四”以来的新旧诗之争,通过对诗学传统的清理,思考、寻求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二者殊途同归,都对中国诗歌的形式研究做出了贡献。而尤以后者的工作结出了现代形态的诗学研究的第一批果实。

据我考察,自刘铁冷《作诗百法》(崇新书局,1913)、谢无量《诗学指南》(中华书局,1918)以降,民国年间刊行诗法类著述近50种,以陈去病《诗学纲要》(东南大学,1927)、黄节《诗学》(北京大学,1919)、蒋兆燮《诗范》(世界书局,1931)等较为通行。这些著作有旧式的与新式的两种写法:前者继承传统蒙学诗法的形式,像古代同类著作一样,有自著与纂辑两种形式。纂辑之书以刘子芬《诗家正法眼藏》为代表,自序云:“国民政府新都已建,金陵遂成人文荟聚之区,不但新文化分子麋集,能谈中国旧学者众,诗之一道因而盛行于士大夫之间。”^①刘氏暇日搜集古人名言笃论可为作诗法则者,纂成一编。内篇论作法、体制,外篇论作家、作品,详于近时邹启祚《诗学要言》而略于清代各种集粹性诗话(如《锦树堂诗鉴》、《艺苑名言》)。其纂书命名之旨,自然是要荟萃古代诗学的经典理论,供学者借鉴,甚至夸口“自六朝以来一千六百年间诗人学说之精华具在于此”,然而他并未广搜博讨,实不足以凌越前人,惟可由此窥见当时谈诗学诗的一种氛围而已。自著类书则以蒋兆燮《诗范》、徐英《诗法通微》(正中书局,1943)为代表,要之都是从教习的立场出发,祖述前人定论而很少发明。

相比之下,新式的诗学著作因接受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以新的眼光整理旧材料,反而能看出些新意。虽然从总体上说,现代的中国诗学有一个因“西洋文化闯进中国文化的藩篱,一切固有艺术,也将到了一个总结束的时期”的大学术背景^②,但20世纪最初的现代形态的诗学研究,还是在新、旧诗歌营垒的论争中产生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第九章结论是“著者对于新诗人的罪言”,而蒋伯潜《诗》(世界书局,1948)却专设一节论“旧诗之弊”,观点截然相反,而回应新诗运动的动机却同出一辙。本世纪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诗学研究著作刘大白《中诗外形声律说》,据自序说是1919年开始酝酿的。他做这个课题的动机是:

① 刘子芬:《诗家正法眼藏》,自印本,1934。

② 朱右白:《中国诗的新途径》,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给它们开出一篇清单来。如果不做查账、结账的工夫，而只是胡乱地夸耀一下，指摘一下，抵制一下，这种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①

后来闻一多自述整理国故的动机也重复了同样的意思。^②刘书将诗的要害分析为音、步、停、组（联排）、均、协、节、篇、篇群，这九个要素经“差齐律”、“次第律”、“抑扬律”、“反复律”、“对叠律”五种结构方式的交互组合，就构成了古典诗歌变化多端的语言形式。他将这些有例可征的节奏、句法、章法、篇法与西洋诗歌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诗的形式特征是由语言特征决定的，并具有内在的结构美。书中所概括出的形式原理和形式法则都是近代美学的老生常谈，而说五、七言的音步比例，五、七绝的篇章形式都符合黄金律则未免有些附会，但它的研究方式却颇具现代色彩。这样的著作还可以举出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其讨论问题的方式相当学院化。相比之下，更多的著作则往往融研究与教习于一体，如洪为法的系列著作《古诗论》、《律诗论》、《绝句论》（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邵祖平的《七绝诗论诗话》（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等，其中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但将诗体的源流、作法梳理叙述得非常清楚，操作上也很有现代学术的规范。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诗学著作如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像李维《诗史》、陆佩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详后）一样，都将词曲包括进来，显示出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诗学体系对正统诗歌观念的突破。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词和散曲可

① 刘大白：《中诗外形声律说》序言，夏敬观铅印本，1943。

② 闻一多1943年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①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诗话形式仍然承担着一部分古今诗歌批评的任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华图书馆,1910)、陈衍《石遗室诗话》(广益书局,1915)乃至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间油印本)、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大公报社,1933)之类都曾在不同范围内产生影响。一批“纪事”体与传记体的研究著作,包括陈衍的辽、金、元诗纪事、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栩楼刊本,1935),陈乃乾的《启祯两朝遗诗考》(上海旧学庵,1920)、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雷璟、雷瑱同辑的《闺秀诗话》(扫叶山房,1922)、《青楼诗话》(扫叶山房,1926),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崇明女子师范讲习所,1922),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甲寅》刊载)等,也以传统的方式对不同范围的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但真正对中国诗学做出可贵贡献的,应该说是诗史和诗学史的研究。有意识地清理诗学基本范畴、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是学者们为学科建设做出的最有益的贡献。朱自清认为批评史的准备工作应该是“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②,所以他首先就“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个传统诗学的基本命题作一番推源溯流的工作,从总体上阐明了中国诗学的传统。郭绍虞有感于“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使用中含义都不一样^③,也有意识地作了一些有关范畴历史演变的研究。在那专题研究尚未蓬勃开展的时代,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笔与诗笔》、《〈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永明声病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不仅揭示了历史上诸多诗学概念内涵的演变,同时也清理了诗史发展的脉络。他还不断

① ②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言,上海,开明书店,1947。

③ 参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61年版后记。

地搜集古代诗话的资料,以《诗话丛话》(《小说月报》2卷1期、《文学》1卷2期)为题发表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从而引发陈一冰、罗根泽、徐中玉、杨即墨、罗振根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徐英在1936年发表《诗话学发凡》(《安徽大学季刊》1卷2期),成为80年代诗话研究热的先声。随着由刘永济《文学论》(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到程千帆《文论要论》(开明书店,1948)完成的文学理论本土化的进程,由陈钟凡、罗根泽、郭绍虞、方孝岳等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的中国诗学史的构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由于西方近代思潮尤其是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诗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都有了更新,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良好的知识积累相结合,就使断代诗学的研究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①专题研究甚至出现了陆晶清《唐代女诗人》(神州国光社,1931)这样的意识颇为超前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曾尝试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解释《诗经》,并在《野有死麋》的阐释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②遗憾的是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结终未能让他完成这项研究。历史学家陈寅恪以《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论著弘扬了钱谦益开创的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研究方式,在当时的诗学中开一代风气,影响深远。相对而言,另一位值得怀念的学者闻一多,所做的主要是筚路蓝缕的学科建设工作。从他留下的大量遗稿与讲义看,他对唐诗文献的整理和对唐诗史的研究具有相当超前的水平,诗人的艺术感觉加学者的勤奋,使他的唐诗批评与诗史研究论文成为至今难以逾越的经典文献。在诗史研究领域,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汉魏六朝是个成就卓著的

①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言:“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实改变了面目。”关于进化论的文学史现在近代的流行,可参看陈伯海《中国近世文学史观之变迁》一文,载《文学遗产》,1993(3)。

② 参看《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